②　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四五，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丁亥。
②⑮⑰　嘉庆《大清会典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
④　《姚端恪公文集》卷十八，《戊子山东纪程》。
⑤⑦　《寒松堂集》卷一，《圣朝大礼既行亟请更定会典事》。
⑥　赵吉士：《万青阁自订文集》卷一，《请红本收藏之所并陈会典编纂之宜事》。
⑧　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，《方志略例》，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》。
⑨　⑪⑭乾隆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首，《条议》。
⑩　⑬⑱⑲㉔　康熙《大清会典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
⑫㉑㉖　乾隆《大清会典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
⑯㉓㉘　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
⑰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二四八，乾隆五十一年二月甲申。
⑳　乾隆《大清会典》，《御制序》。
㉒　乾隆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首，《张廷玉奏》。
㉕　雍正《大清会典》卷首，《续增凡例》。
㉙　《清史列传》卷八，《熊赐履》。
㉚　康熙《六部题定新例》，龚鼎孳序》。
㉛　乾隆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》卷四，《太监条》。
㉜　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七，《通志检存稿》四，《湖北通志辨例》。
㉝　《清宣宗实录》卷一六五，道光十年二月乙丑。
㉞㊳　乾隆《礼部则例》卷首，《原奏》。
㉟　同治《吏部则例》卷首。
㊱　咸丰《户部则例》卷首。
㊲　指同治九年。
㊴　民国二十四年故宫博物院刊行《总管内务府则例》，《叙》。

庚子事变与晚清政局

朱　宗　震

（一）

自从洋务运动以来，清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，如李鸿章、张之洞，适应列强侵华的客观形势，着手搞点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，但这种改革的规模很小，往往局限于地方上，中央体制则变化不大。在维新变法运动中，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，从统治阶级的上层向中下层推移，并且显得更加激进。但当时，维新派的改革纲领也还不太明确和完备。在戊戌变法时期，伸张民权，召开国会的主张，只是在酝酿中，尚未成为纲领性的政治主张。

资产阶级革命派——孙中山，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流亡海外，孤立无援。

总之，庚子以前，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运动，只是处于准备时期。

洋务派，维新（改良）派，革命派，与封建顽固派相比较，彼此之间，在向西方学习方面，存在着某种一致，但是，他们又往往发生强烈的冲突。

在戊戌年间，洋务派曾在不同程度上对维新派表示赞助和支持，康有为说："张之洞本知变法，亲于新党。"①就是遭维新派抨击的李鸿章，也曾表示："欲为数十年而不能，彼（指康、梁维新派—引者）竟能之，吾深愧焉。"②但洋务派不愿同顽固派决裂，而对维新派酝酿中的民权主张，当时即使在口头上也还难于接受。所以，张之洞著《劝学篇》，鼓吹"中学为

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划清了与维新派的界限。并且，在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决战的当日，站在了顽固派一边。洋务派的传人，当时声名未著的袁世凯的变节，只是集中地反映了洋务派的政治动向。

戊戌政变之后，封建顽固派控制了朝政，大肆镇压维新运动，倒行逆施，甚至恢复了最腐朽的制度和机构。封建顽固派几乎排斥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，甚至连洋枪洋炮都企图弃而不用。兵部尚书刚毅甚至认为：“有藤牌地营，则枪炮不足畏，能徒手相搏，则洋人股直硬，申屈弗灵，必非我敌。”③这样，连洋务派都受到顽固派的压制。当时，“凡言变法诸臣皆得罪。”④张之洞仅因先著《劝学篇》才得免议。而政变之后，张“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，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。”⑤而李鸿章竟至“都人多目为康党。”⑤

闭关锁国的封建顽固派，不符合列强侵华的利益。因此，列强对有限度的戊戌变法，表示了一定的同情，政变之后，对维新派进行了庇护，对顽固派进行了抨击。而当慈禧企图废黜光绪时，列强进行了干预。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半官方身分，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：“我坚信，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，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。”⑦列强需要洋务派那样的买办性的资本主义改革。然而，封建顽固派受戊戌变法的刺激，拒绝一切变革，进而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。

由于受到国内外舆论和列强的牵制，慈禧不敢明目张胆地废除光绪，遂有“己亥立储”之举，即于1900年 1 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，继承同治。然而，立储之举，仍然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。当时，清廷“欲遂立溥俊，各公使不听，有违言。太后及载漪内惭，日夜谋所以报。”⑧而且，国外一直存在着要慈禧归政的舆论，这使封建顽固派和列强的矛盾尖锐起来。

这时，山东，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发展，于是，就发生了清廷利用义和团以排外的决策。所以，当时《中外日报》评论清廷的政策演变过程说：“盖起于守旧，成于训政，迫于废立，终于排外，四者相因。”⑨

（二）

义和团运动本是一场群众性的抵抗帝国主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侵略的运动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，加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，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产。而教会，作为列强侵华的开路先锋，越来越广泛地渗入到内地，成为列强在中国地方上的一股政治势力。由于教会势力欺压群众，造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民教斗争。义和团运动就在民教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。

民教相争中的民包括了乡绅地主，农民和其他劳动者，他们是旧的生产方式下的基层群体，他们在和教会和教民的斗争中，以及与列强经济渗透（如筑路）的斗争中，乡绅地主往往是斗争的主持人。但是，清朝地方官吏，历来在民教相争中，“非视夷如仇，即畏夷如虎”，⑩“畏事者袒教虐民，沽名者庇民伤教，官无持平办法，民教之怨，愈结愈深。”⑪结果，“久之，民气遏抑太甚，积不能忍，以为官府不足恃，惟私斗尚可泄者忿。”⑫乡绅地主因此往往和游民社会结合起来，而游民社会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绪，于是，“义气相尚，心必直爽，路遇不平，不惜躯命代为伸理。”⑬对洋人抱有复仇心理的愚昧的地方官，也往往坐山观虎斗。所以，袁世凯说：“良民（即乡绅地主——引者）郁极思逞，乃起而与教士、教民为难。官正亦苦无如教何也，亦思借民以快报复，有仇教者，不但不肯查禁，或对众讽煽，不啻潜导而阴

驱之……适有不逞之徒（即游民——引者），乘间滋事，结伙聚徒，当知良民之为教民欺凌也，辄诳诱乡愚（即农民——引者），勾引报复，焚毁教堂，抢掠教民。”⑭这一段话，集中地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掀起时的阶级关系。

但是，游民社会（即大刀会、义和拳之类）广泛地卷入民教斗争之后，吸引了大批农民参加，激起了农村暴动。农民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体。这使统治阶级面临着复杂的形势，从而产生了主剿主抚派的分野。主剿派不愿开罪列强，他们强调义和团暴动的一面，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就曾指出，“义和拳之必反，凡有识者，无不知之。”⑮袁世凯也强调指出，义和团“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，鞭挞五洲，尽驱彼族，而该匪等势成燎原，不可响迩，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！”⑯主抚派并非不镇压义和团暴动，但他们由于倾向排外，所以更希望把义和团纳入自己的排外轨道。他们主张“设法开导，化私为公，俾其有勇知方，可储为异日有用之材。”⑰从而由官府予以掌握。正是在主抚派默许下，义和团运动半合法地蓬勃发展起来。山东巡抚毓贤听说义和团打着山东巡抚部院“保清灭洋”大旗，“益自喜。”⑱在直、鲁一带，“官民皆目之为义民”，⑲主抚派占了上风。

主抚派的策略设想，并非是毫无依据的，而义和团由于自身的素质和复杂构成，也在相当程度上为统治者所左右，并打出了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帜。从当时形势发展来看，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因素大体如下：首先，民教斗争，“大抵皆由一时一事相激而起，无与官为敌之心也。”⑳也就是说，义和团的起因，并不是针对官府的。第二，乡绅地主加入了义和团，所谓“尽有衣冠之族，殷实之家杂乎其中。”㉑因此，官方可以有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，听其自卫身家，守望相助”㉒的计划。第三，游民社会本无一定宗旨，统治阶级利用游民社会、招抚游民首领是有传统的。武卫军统领董福祥和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素有交结，即为突出事例。第四，义和团运动的分散性，更便于统治者剿抚兼施。而造成这种分散性的原因，一是民教斗争本来就是分散进行的，二是作为义和团骨干的游民社会本来就派别林立。第五，农民群众大量进入斗争前列之后，为时太短，没有能经过长期的战斗洗礼，淘汰游民社会的劣根性，充分发挥农民的质朴的革命本质，建立起有组织的、有严明纪律的队伍，如同土著农民为骨干的太平军那样。从反面的原因来说，教会势力，毕竟在中国根基不固，还不构成具有严密组织的集团力量，这也使以反洋教为主要目标的义和团，不可能在同教会的长期斗争中锻炼成熟。第六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农民和游民的反帝斗争，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，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前景，只能是盲目的排外，这就同封建顽固派的排外，有相通之处。这一切，就造成了在庚子年的特殊形势下，旧生产方式下的各阶层在反帝斗争中的暂时的联合。

清廷在列强的压力下，虽然下过镇压义和团的命令，但态度暖昧，实际上坐视义和团的发展。1900年5、6月间，当义和团在京畿、直隶地区蓬勃发展，慈禧令刚毅、赵舒翘等前往涿州一带“宣抚”，“名为宣旨解散，实隐察其情势也。”㉓刚、赵回报，则“均力言义民无他心，可恃。”㉔由于列强正向中国增兵，进行军事威胁，慈禧在载漪等人的怂恿下，遂决心武装义和团以抵抗列强，妄图通过对外战争的冒险，来强化封建顽固派的统治。6月中旬，京外义和团被大批引进京内。清廷于6月16日起，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，作最后的决策，并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，声言“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。”㉕23日又命载勋、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，强化对义和团的控制。

清廷所以敢于冒险一战，一是为群众的激昂的排外情绪所鼓励，慈禧说：“今日中国积弱已极，所仗者人心耳，若并人心而失之，何以立国？”㉖他们从反动的政治目的出发，企图利

用群众由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而出现的落后的排外情绪。二是迷信神术，因而可以寄托战胜列强的幻想。载漪认为："义民可恃，其术甚神，可以报仇雪耻。"㉗ 慈禧在事后也说："当乱起时，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，怎样忠勇，怎样的有纪律，有法术，指影画态，千真万确，教人不能不信。"㉘ 然而，清廷对义和团的控制，使这场运动的落后面和游民的劣根性大大膨胀起来。义和团在清廷的操纵下愚蠢地进攻使馆区，作出了无谓的牺牲，义和团在顽固派参与下，以杀二毛子为名，大搞神术恐怖，义和团在北京焚烧前门商业区，甚至肆意抢掠，滥杀无辜。因此，义和团运动既是民族的正义的怒火的一次集中喷发，又是正在瓦解中的旧生产方式的一次痉挛。

清廷的排外，和农民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奋起反抗，在性质上完全不同。慈禧在决定宣战时说："我为江山社稷，不得已而宣战。"而群臣回答说："臣等同心报国。"㉙ 他们所激发的是封建爱国主义思想。毛泽东同志说："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，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。"㉚ 而当时，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，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丧失了任何进步意义，它只能把群众的正义斗争引向邪路，只能使民族蒙受更大的耻辱，而且，它很快就转变为彻底的卖国主义，清廷不久即用人民的尸骨，去乞求列强的宽恕。

当然，封建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群众的斗争，并不是清廷所能完全驾驭得了的。义和团到处与清朝各级政府分庭抗礼，甚至发生严重冲突，就是在北京，也"专杀自如。"㉛ 群众的反帝斗争，使清政府的统治陷于瘫痪，在复杂的时局面前，手足无措，失去了常态。所以，慈禧说："那时纸老虎穿破了，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。"㉜ 当然，由于义和团以"灭洋"为纲领，因此，它主要是冲击了封建的政治统治秩序，而不是冲击农村的封建的生产关系。

（三）

南方与北方不同，这里的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开展，资产阶级各派系的政治影响也较大，因此，尽管南方也发生了排外活动，但没有能象北方那样发展起来。

掌握着封疆实权的洋务派官僚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，如粤督李鸿章、鄂督张之洞、江督刘坤一，及后起的鲁抚袁世凯，他们既不相信义和团能够战胜列强，也不愿意开罪列强。以李鸿章领衔，南方各省督抚曾联名上奏，认为"乱民不可恃，邪术不可信，兵端不可开。"㉝ 他们主张对义和团"明降谕旨，定计主剿"。㉞ 他们较之清廷内部的主剿派如光绪、许景澄、袁昶，及不敢明言的主剿派如奕劻、荣禄等人，有着更强的实力和发言权，他们可以直接依靠列强的支持。李鸿章把清廷的宣战谕旨看作顽固派的"矫诏"，表示"粤断不奉"，㉟ 并电盛宣怀转告刘坤一、张之洞。为李鸿章主持官督商办企业起家的盛宣怀，更在列强驻沪领事和江、鄂两督之间，奔波划策，达成了《东南保护约款》，即"东南互保"，由各省督抚自行镇压群众排外活动，保护列强在华利益，充当列强在华代理人。这一条约得到东南各省督抚及山东、陕西、河南诸省巡抚的广泛支持。这些地区，群众反教会斗争及反对列强在华势力的斗争，遭到严厉的镇压。

流亡海外的维新派，同样反对义和团的排外活动。康有为说："拳匪作乱，杀害各国人民，因及公使，祸酷无道，闻之愤怒，令人发指。"㊱ 当时，康有为创设了保皇会，正在策动长江一带的游民社会实行勤王武装暴动。但长江一带的游民社会和北方的一样，在发放的票布中，"有曰灭洋者，有曰杀尽洋鬼者，其宗旨实则排外，与义和团相等。"㊲ 于是，维新派改

发富有票，将“灭洋”字样改为“自立”或“救国”等字样，以改变游民社会的排外宗旨，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。康有为制定了保皇会起兵的方针：“我南方勤王义勇，已分布数路，不日将起，既成方面，可与外国订约，行西律西法，一面分兵北上勤王，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。”㊳并且，他正在争取英国政府支持光绪复辟。维新派在国内的主持人唐才常，于7月26日在上海成立国会，又赴汉口策动张之洞宣布两湖独立。但张沉机观变，待自立军一支在大通起兵，张即捕杀唐才常，镇压了自立军暴动。

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，也不赞成义和团的排外。他在是年6、7月间给香港总督卜力的信中，指责清廷“妖言惑众，煽乱危邦，酿祸奸民，褒以忠义，是谓诲民变。”㊴孙中山的救国路线，不主张同列强直接对抗，而是通过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府”㊵的道路，来达到民族振兴的目的。他一直在和游民社会进行广泛的联络。他说：“（当时）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，唯所称下流社会，反有三合会之组织，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，虽时代湮远，几于数典忘祖，然苟与之言，犹较缙绅为易入，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。”㊶这时，孙中山通过史坚如，运动长江会党与两广、福建会党一起加入兴中会，准备同时起义。但长江会党旋为保皇会收买。与此同时，香港英国当局正在活动革命派与李鸿章合作宣告两广自主。李通过幕僚刘学询进行活动，进行政治投机。孙中山一面准备武装起义，一面也试探与洋务派官僚及维新派合作，据南方诸地独立，建立共和政体。但李鸿章经一度观望后，决心应清廷之命北上，合作没有实现。孙中山于10月间发动的惠州起义，也宣告失败。

综上所述，资产阶级各派系，尽管在政治利益上有很大的差别，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西方，都不可能同列强直接对立。因此，他们对于旧生产方式下各阶层的排外活动，都表示反对。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自己的反清革命纲领，吸引着群众。但是，他们还没有力量把群众的反帝斗争，引向正确的轨道。然而，资产阶级各派系，乘群众暴动，清廷统治削弱之间，都在极力扩张自己的实力。庚子年洋务派、维新派、革命派彼此之间合作的尝试，是辛亥革命时合作推倒清朝的一次预演。

（四）

庚子事变的结果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占领了北京，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。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之后，重新向列强俯首称臣，于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和约》。列强则确立了扶植清廷共同统治中国的格局。

经过庚子事变，封建顽固派经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。英、德等国一度打算压迫慈禧归政，经李鸿章、张之洞等说项，达成了严惩载漪为首的十大臣的协议，慈禧才得以于1902年初回到北京。这样，清廷中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封建顽固派，大体上被清除了。当然，列强并非要扫清中国的封建主义，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，而是要使清廷更驯顺地充当列强的走卒。

与封建顽固派受打击相对应，洋务派的势力，再次发展起来。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刘坤一、盛宣怀等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发言权得到加强。尤其是洋务派的传人袁世凯，在列强和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，于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后，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翌年实授，着手建立起北洋系。

而清廷也决心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充当列强在华代理人。依照列强的意旨，清廷于1901年1月29日即下变法诏，慈禧表示要“取外国之长”，“补中国之短”，令臣下

“参酌中西政要”，“当因当革”“详悉条议以闻”。[42] 4日21日，又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，筹办“新政”。依据洋务派的主张，着手改革。这样，洋务派的封建买办性的国家资本主义路线，正式作为清廷中央的方针，得以确立。尽管满族亲贵还不善于搞“洋务”，但这个方向，不再逆转。

当然，历史的发展，并不以列强和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。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，作为列强和洋务派的对立面，也享受着封建顽固派受到打击的硕果。

资产阶级维新派，在戊戌变法期间，还不敢把召开国会一类的主张，作为正式的政治纲领提出来，而庚子事变后，于1902年起，他们即开始大举鼓吹君主立宪，由维新派——保皇派，发展为立宪派。不仅流亡在外的梁启超，成了立宪派的灵魂，而且国内以张謇为代表，也公开地发起了争取立宪的运动。无论在国内国外，立宪派的政治地位都大大加强了。

而革命派的势力，更蓬勃发展起来。清廷在庚子事变中的反动，使大批爱国志士摆脱了改良思潮的羁縻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参加上海国会的章太炎，毅然剪掉发辫，决心革命。自立军失败后，其成员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华兴会、光复会等革命组织，迅速发展。遂有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。孙中山论述其中的转机说：“当初次之失败也，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、大逆不道……惟庚子失败之后，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，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后相较，差若天渊。”[43]

• • • •

庚子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。庚子事变，是中国农民，对列强侵略，积六十年愤怒的一次集中爆发，这次爆发也是中国旧式农民暴动的终结。庚子事变，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列强侵华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反抗，这次反抗的惨败，是闭关锁国派的终结。庚子事变是中国民主革命从准备时期到正式展开时期的转折点，庚子事变以前，是资产阶级各派系政治活动的准备时期，还缺乏完备的政治纲领，而庚子以后，各派系的政治纲领，趋于成熟，他们的政治活动，就全面展开了。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，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，到庚子年，这一地位宣告确立。而从庚子事变到全国解放，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确立到被推翻的时期，中国的革命，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，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因此，庚子年的转折，具有划阶段的意义。

---

① 《康有为与保皇会》第31页。
②⑥㊲ 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第197、246页。
③④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戊戌变法》(一)第468、469、335页。
⑦ 《戊戌变法》(三)第530页。
⑧⑱㉓㉔㉖㉗㉙㉛㉝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：《义和团》(一)第11、361、47、12、48、13、49、15、15页。
⑨⑪⑬⑮⑰⑲⑳㉑ 《义和团》(四)第226、88、453、467、453、453、467、452页。
⑩⑫⑯㉒㉕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上册第28、6、59、15、163页。
⑭ 《筹笔偶存》第157—158页。
㉘㉜㉞㉟ 《义和团》(三)第436、436、327、334页。
㉚ 《毛泽东选集》52年版第2卷第509页。
㊱㊳ 《康有为政论集》上册第424、414页。
㊴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第192页。
㊵ 《檀山华侨·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》。
㊶ 《中国之革命》，《申报》馆编：《最近之五十年》。
㊷ 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下册第916页。
㊸ 《孙中山选集》第199页。